



汉魏子书研究

Research of Zi Shu in Han and Wei Dynasties

尹玉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汉魏子书研究

Research of Zi Shu in Han and Wei Dynasties

尹玉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子书研究 / 尹玉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203-2414-4

I. ①汉… II. ①尹… III. ①古籍-研究-中国-汉代②古籍-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G25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377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孙少华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413 千字
定 价 9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汉魏子书研究》序

刘跃进

古代典籍中的经史子集四部，子部的含义最为宽泛，好像三部以外的所有典籍，都可以放在子部中。《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云：

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

在作者看来，经书之外，凡“立说者皆子书”，包括十四类，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后来还有佛家，有道家，内涵、外延都不确定。先秦、秦汉之际，集部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当时的著作，除经史之外，多是子书。经书，乃圣贤著作，非常人所能觊觎，史书也多具有官方色彩，私家撰史，风险极大。只有子书，个人发挥的空间很大，可成一家之言。所以，先秦诸子驰骋才华、著书立说，为中国思想史的宝库平添绚烂的色彩，赢得后世尊重。

秦汉以下，司马迁发愤著书，以“成一家之言”作为奋斗的目标，极大地激发了历代文人进德修业、立言不朽的理想。西汉后期，各种学说纷纷亮相，异端思潮横空而出，这就使得汉魏子书所呈现的面貌与此前全然不同，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汉书·艺文志·诸子》所载西汉前的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隋书·经籍志》所载诸子“合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比《汉志》多出六百六十多部（家），扣除《汉志》所录子书，至少也有四百多部（家）著作完成于这

个时期。因此，说汉、魏、晋是子部著述的最后辉煌，殆不为过。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个时期大家如此重视子部著述？从当时言论中，或许可以捕获到这个答案的蛛丝马迹。曹丕《典论·论文》说徐幹“著论成一家言”。《与吴质书》又说：“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恢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尽管徐幹的政治业绩无可称述，但有一部《中论》足以让他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在古人心目中，即使立言，也没有文学的地位。曹植就说过：“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他希望能够“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与杨德祖书》）采实录、辨时俗，这正是汉魏子书的重要特征。王充《论衡·自纪篇》说：“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别通篇》又说：“通人积文，十箴以上，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显然，在这些人看来，经史为大学问，并不是人人可以随意置喙；而子书则不然，自抒胸臆，析理论政，非常自由，尤其是刺世讥俗，更是迎合了汉魏六朝文人标新立异的心理。葛洪著《抱朴子》内外篇，梁元帝萧绎著《金楼子》，也都以“立一家之言”期许。即便是像刘勰这样的文学家，他创作《文心雕龙》，其实是把它当作子书来写作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成就一家之言。文集地位的空前提高，那是南朝以后的事。

尹玉珊敏锐地关注到汉魏转型时期子部著作的独特性，在《汉魏子书研究》一书中，她系统地考察了这个时期子书的生成、演变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就我有限闻见所知，这应当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汉魏子书的专著。全书的章节安排依照现在通行的做法，首先是宏观考察，有历时性的沿波探源，有共时性的比较研究。其次是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专题研究。附录则是单纯的文献考证。而在实际研究中，这个过程正好相反，一定是先从书后所附文献考索做起。文献收集、整理、研究是基础，是前提。附录有三个文献专题，体现了作者研究的三个最初阶段。最基础的工作是查阅资料，撰写叙录。作者指出，汉魏子书的存佚有三种情形：一是整书留存者，二是整书散佚经后人辑佚者（多为残本），三是全部散佚片字不存者。有文字流传固然重要，就是只字不存的子书也有其价值，至少让我们知道在某一时期、某一地点，曾经产生过某种子部著作，由此可以窥探那一特定时空曾经发生过的思想活动。基于这样的认识，作

者汇集这个时期五十八部子书，从写作时间、作者、卷数、留存情况、主要内容、主要价值以及参考文献等方面逐一论列，资料丰富而清晰。其次是辑佚工作。作者充分注意到前人的辑佚成果，对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三卷之《魏子》《任子》和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等著作中未见辑录，且今人也未曾注意者，重点关注。有些文字，前人虽有辑录，但尚存讹误，作者也给予校订，为读者提供进一步研讨的线索。文献工作的第三步骤是综合分析。作者选取桓谭《新论》辑本作为讨论的样本，对所知《新论》十五种辑本，辨析成绩，指出不足。作者还撰写专文，对朱谦之新辑桓谭《新论》做了要言不烦的评述。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汉魏子书研究》上下两编则是综合性的论述。上编主要围绕汉魏子书产生的历史环境、自身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宏观考察，努力把它们还原到特定的时空中，描绘出动态的发展过程。今天，我们讨论子部著作，多有约定俗成的看法，与当时关于“子书”的理解不尽相同。譬如子书称谓，汉魏时期使用得比较广泛的有五种，即（一）“一家之言”和“家人言”；（二）“新书”；（三）“短书”；（四）“书论”；（五）“子书”。名称不同，但其内在的思想脉络、学理内涵，大体是相近的。第一，汉魏子书作者从事写作的最重要目的，或者说子书的最重要特征，是对思想独立性的追求，既不依附经书，也不拘泥史实。第二，早期子书撰写过程中，不论是门人参与或弟子代笔，其著作大都统一署上主持者的名字，汉魏子书与此前的创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从“假手”到“亲著”，个人特点日益彰显。但这些变化，并不能改变其私人著述的性质，绝无官方介入的可能。第三，子书往往涉及很多专题，各专题之间又有其内在系统性，所以其编排颇为考究，多以整书形式呈现，而不是单篇文章的简单集结。第四，子书的内容既博且杂，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开放结构，又不着重于知识技能的普及，重在论“道”讲“理”。譬如《吕氏春秋》所称的“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其实就是一部先秦以来的子部类书，看似散漫无绪，实则思想指向非常明确。第五，子书的表达方式以议论为主，叙述为议论说理服务，文中所举事实和人物都以说理为中心，具有“辩难”特点。这些概括，比较精当，非常全面，很有启发性。

《汉魏子书研究》下编多为专题论文，旨在考察汉魏子书与经、史、文学、社会及文人生活的复杂关系。譬如《刘向对〈汉志〉“小说家”文

4 《汉魏子书研究》序

献的搜集整理》一章，基本厘清了《汉志》“小说家”的作者与文献状况，也为认识《说苑》《新序》两书的性质提供另外一种解释。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评价刘向在文献整理上的贡献。《徐幹〈中论〉引〈诗〉与汉魏之际的〈诗经〉学》探讨并解决了徐幹引《诗》与其诗学传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汉魏子书引《诗》规律，也为了解汉魏之际诗学状况开启一扇窗口。

总而言之，《汉魏子书研究》充分注意到汉魏转型时期的文化特点，以子书为线索，综合考察汉魏时期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立体地呈现出汉魏时期的文化风貌。从纵向上说，本书疏通了诸子学术从春秋战国、两汉三国至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脉络，展示了先秦两汉以来子书发展的动态过程，揭示了这一发展过程中若干规律性问题并给予合理的阐释。从横向上说，本书初步揭橥汉魏子书与文学、文体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汉魏子书对文学理论的贡献以及在推进文体规范上的重要作用。这样的研究，拓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还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汉魏时期，经、史、子、集的互动关系还处在动态变化阶段，比较复杂，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譬如：汉魏诸子对于先秦思想与学术的改造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这种改造与当时社会现实有着怎样的联系？子书作者提出了哪些具有思想史价值的命题？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以及后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起到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还需要多方面的考索。这正说明，学术永无止境。我们期待着作者勇于拓展，拿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2017年9月8日拟于京城爱吾庐

目 录

绪论 “子书”的界定与本书研究的范围	(1)
第一节 “子书”的界定与“成一家之言”	(3)
一 “子书”在汉魏时期使用得比较广泛的几个称谓	(3)
二 本书对“子书”的界定	(10)
第二节 汉魏子书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子书创作的第二个高潮	(12)
一 汉魏子书在数量与规模上的宏富	(13)
二 汉魏子书对后世（限于晋南北朝阶段）影响深远	(14)
第三节 本书研究的时间断限和研究范围	(17)
第四节 本书研究的缘由、方法和目的	(19)

上 编

第一章 汉魏子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27)
第一节 汉魏子书产生的历史背景	(27)
一 政治上的大一统	(27)
二 先秦子书文献在秦代的保存	(29)
三 私人著史的出现	(31)
四 纸张的发明	(32)
五 经学成为禄利之途	(33)
第二节 汉魏子书兴盛的原因	(34)
一 学术发展的必然	(35)
二 子书自身的优势	(37)
三 子书在地位上与文人的相互遇合	(40)
第二章 汉魏子书的特点	(43)
第一节 汉魏子书作者群的特点	(43)
一 因失意于当世，皆寄望于未来	(43)
二 批经以批判现实	(46)

2 目 录

三 “言以载道”向“借言扬名”的转变	(49)
四 关注现实政治本身	(53)
五 有意于“作”，书成己手	(55)
第二节 汉魏子书文本的特点	(57)
一 书名包含作者寄托	(58)
二 篇名基本涵盖篇旨	(59)
三 百家思想的细化与融合	(60)
第三章 汉魏子书的体式	(67)
第一节 杂篇	(68)
第二节 自传	(70)
第三节 大序	(74)
第四节 小序	(77)
第四章 汉魏子书的发展过程	(82)
第一节 在对先秦诸子著作经验的扬弃中创新	(82)
第二节 摆脱历史枷锁后的发展	(85)
一 “假手”“藉口”与改编	(86)
二 “模仿”与批判	(87)
第三节 迎来属于新时代的高潮	(91)
第四节 对前人的总结与对后世的垂范	(93)
第五章 汉魏时人对子书的评价	(97)
第一节 子书作者的评价——奖掖、呼应或自我检讨	(97)
一 对已作现世教化与后世扬名的期许	(97)
二 先秦诸子的“脱子入经”给予汉魏诸子的深刻影响	(102)
三 对子书泛论中体现出汉魏诸子的“卫道”精神	(107)
第二节 非子书作者的评价——企羡、同情或嘲讽	(109)
一 经、史学者对诸子“文章”的肯定与对其所寓之“道” 的贬抑	(109)
二 执政者的猜忌与自负	(112)
三 其他对著作子书的憧憬与对作者的企羡	(113)
第六章 汉魏子书的泛称——“新书”	(115)
第一节 “新书”之称不始于刘向校书	(115)

第二节 “新书”曾作为子书的泛称流行于汉魏	(119)
第七章 汉魏子书的辩难风格和文学影响	(124)
第一节 司马贞对桓谭《新论》的误读	(124)
第二节 汉魏子书论难传统的思想渊源	(131)
第三节 汉魏子书对先秦诸子辩难的批判继承和文学影响	(137)
第八章 汉魏子书的文章学意义	(142)
第一节 汉魏子书对文章产生根源的追究与文章功用的探讨 ..	(142)
第二节 汉魏子书对文辞态度与表现方法的争议	(150)
第三节 汉魏子书对文学批评与欣赏的认识	(153)
第四节 汉魏子书对各种文体的讨论与对“论”体文的树典 垂范作用	(157)

下 编

第一章 汉魏子书中的孝论	(171)
第一节 西汉子书论孝——从自由走向维护	(172)
第二节 东汉子书论孝——台上的捍卫与抵制	(182)
一 东汉子书对“孝”的理论探讨	(182)
二 东汉子书中习用“汉家”称谓的意义	(186)
第三节 三国子书论孝——反思、总结与回归	(187)
第二章 汉魏子书中“过秦”话语的演变及其时代思潮	(190)
第一节 西汉子书言秦多批判	(191)
第二节 东汉子书言秦多借喻	(198)
第三节 三国子书言秦多理性	(201)
第三章 汉魏子书中的“重禄养清”思想	(205)
第一节 “禄过其功”的警告	(207)
第二节 “薄禄”现象的批评	(210)
第三节 “重禄”以养“清”的共识	(212)
第四章 汉魏子书中的王、霸之辨	(216)
第一节 汉魏子书中有关“王、霸之辨”的记录	(216)

4 目 录

第二节 汉魏诸子关注“王、霸之辨”的原因	(221)
第五章 汉魏子书杂记	(226)
第一节 桓谭《新论》杂记	(226)
一 《琴道》篇与桓谭墓的挖掘和桓谭读书台	(226)
二 “王翁”之辩	(230)
第二节 王充《论衡》杂记	(231)
一 王充《论衡》“宣汉说”与《对作》篇的解读	(231)
二 王充以《论衡》授徒刍议	(234)
第三节 曹丕《典论》杂记	(236)
一 作书时间	(236)
二 作品数量的疑问	(237)
三 开创与树典,《典论》的命名	(238)
四 “文章”与“经国”的关系	(239)
第六章 刘向对《汉志》“小说家”文献的搜集整理	(241)
第一节 《新序》《说苑》中所能见到的《汉志》“小说家” 文献	(241)
第二节 基于遗文艺术风格解读基础上的《汉志》“小说家” 标准	(256)
第三节 刘向在建言思想指导下以《新序》《说苑》两书保存 《汉志》“小说家”文献	(260)
第七章 徐幹《中论》引《诗》与汉魏之际的《诗经》学	(268)
第一节 《中论》引《诗》特点	(269)
第二节 《中论》引《诗》与汉魏之际的《诗》学传统	(275)
结语 宏观综合研究在汉魏子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284)
附录一 汉魏子书叙录	(288)
附录二 汉魏子书辑佚	(309)
附录三 评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	(324)

附录四 桓谭《新论》辑本文献综述	(336)
------------------------	-------

参考文献	(349)
------------	-------

后记	(353)
----------	-------

绪论 “子书”的界定与本书研究的范围

“子书”的界定有待于对著者身份的确认，而对“子”的身份认定古今不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春秋时仅为“诸子百家”之一，儒学虽一度成为“显学”，但孔子地位并未远超其他诸子。孔子歿后，儒分为八，儒家思想借七十子之徒广泛传播，生徒们出于“自神其教”的需要，不断抬升孔子地位。汉代，武帝出于“大一统”政权的考虑，给予孔子和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特殊尊崇，更使他在政治上超拔于诸子行列。汉人扬雄等把儒家在政治上的尊崇实践于文化上，继而擢孔、孟于“子”之外，以传经的典范定位《论语》与《孟子》二书，完成了二书的“脱子入经”过程。李唐以降，《论语》与《孟子》的地位跟随孔、孟二人一再被提升，至赵宋被朱熹归入“四书”，孔、孟二人也被定位为圣人与亚圣，远诸子尊贵。上述可见，各个时代对于“子”的界定差异并非源于学术需求，而是在政教思想指挥下，依据作者思想对于现实政治社会影响与作用而做的等级区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且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①《提要》强调“子书”的两大特征为：立言以区别于记事；一家专著以区别于众人杂编。考虑到先秦子书少有诸子手著的体例，则汉魏子书更加符合《提要》中这两个条件。但其《子部总叙》中却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②可见《提要》一方面立足于文献目录学角度宽泛地划分“子”，另一方面还持有道统的偏见，要为诸子分出高下。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民国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本，第11册，第60页。

②（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91页。

2 绪论 “子书”的界定与本书研究的范围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旧制度的解体，孔、孟二人才被政治释放，走下圣人宝座，重新回归先秦诸子的学术队伍中。尽管如此，现代学者对于“子”的身份认同也并不一致，尤其在审视汉魏诸子时，往往带着厚古薄今的偏见。如吕思勉说：“子书之精者，讫于西汉。东汉后人作者，即觉浅薄。然西汉子书之精者，仍多祖述先秦之说；则虽谓子书之作，讫于先秦，可也。然远求诸西周以前，则又无所谓子。然则子者，春秋、战国一时代之物也。”^①吕氏在文中先以“子书”言称汉代诸子著作，后又鉴于其思想相较先秦子书有原创与否及深、浅之别，而把两汉子书拽出子书之列，从而得出“子书”为春秋、战国的时代特产这一结论，可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又如余嘉锡说：“传注称氏，诸子称子，皆明其为一家之学也。《诸子略》中，自黄帝至太公、尹佚不称子者，此其人皆古之君相，平生本无子之称号也。周初惟《鬻子》称子。自陆贾、贾谊以下不称子者，学无传人，未足名家也。”^②余氏之所以排除汉魏诸子在“子”之外，源于其“学无传人，未足名家”。即余氏以为，称“子”者条件有二：第一，著者平生有“子”的称号；第二，著者学说著作有传人，可成一家之学。遵此，则西汉及以后诸子不当称“子”，其著作亦非“子书”。其实，如果照此条件严格衡量先秦诸子的话，也并非全部符合。汉魏诸子中，陆贾、贾谊二人不称“子”，但以后的淮南子、周生烈子、抱朴子，何尝不称“子”？所以，如以思想的发明与原创衡量先秦与汉魏诸子，的确会有今不如昔之慨，但因此而否定其诸子身份则不免偏激。

当代学者，本着继承诸子学术传统与建立“新子学”的愿景，不断延展子书研究的视野，拓宽其研究对象，但对于“子”及“子书”的内涵也没有明确阐释。因此在着手构建本书的主体框架前，对“子”及“子书”的界定很有必要。只有这两个概念界定清楚，本书的研究范围也才能划定。

历史问题尚需回归历史情景中才能切实解决。因此，本书试图借助文献考据与理性的逻辑推理这两大媒介，潜回汉魏时期的历史情景中，考察当时人究竟如何看待那些流行于汉魏文人中间的，不仅没有被经学与玄学淹没遮蔽，反而越发显著地影响到文人生活与思想，最终攀上其巅峰的“杂说”著作如何在思想文化的长河中滚滚而来。

①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②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3页。

第一节 “子书”的界定与“成一家之言”

一 “子书”在汉魏时期使用得比较广泛的几个称谓

(一) “一家之言”和“家人言”

子书在汉魏时期被习用的诸多称谓中,以“一家之言”和“家人言”居首。《汉书·儒林传》云:“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击毚。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毚正中其心,毚应手而倒。”^①文中的“家人言”,钱穆解释为:“今考家人言者,秦博士鲍白令之对始皇曰:‘武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言其公,家言其私。家人言,乃对王官之学而言。犹云民间私家之言耳。凡战国诸子所以称百家,皆谓其非王官学。”^②钱氏把“家人言”释为“民间私家之言”,即诸子百家之说。老子之学确实非王官之学,但先秦诸子百家哪一家是王官之学呢?班固在《汉志》中追溯诸子之学的源头时也只说“出于某官”,他意图在私家之言与王官之学间建立一种源流系统。如果论思想渊源,官学在前,私学在后,晚出者难免不受在先者影响,但论其必然联系则不确定,班固也没有提供真凭实据。诸子既非君相,其学又未立为学官,诸子的学术只能出自民间。辕固的本意显然是用“家人言”贬低太后所爱的《老子》书,所以才会惹怒太后,他的本意在劝导窦太后关注儒家学说。既然儒家和道家同出民间,那么辕固所云的“家人言”一定不在于强调其“民间私家之言”的身份,而应着眼于是否有益于治国之事。联系辕固的学术背景,以及他所言说的对象是窦太后等因素,这里的“家人言”带有否定与贬低之意,暗指黄老道家思想有股小家子气,不如儒家恢宏。

司马迁所宣扬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③是他写作《太史公书》的终极目标。《史记·自序》云:

①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2页。

② 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94页。

③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①“一家之言”是他对于《太史公书》的最高追求，试图通过自己的“一家之言”实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政治使命与人生意义的重大课题。此处“一家之言”或“一家言”的意思与辕固所言的“家人言”显然不同，从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可以看出司马氏的“一家之言”和六艺传书、诸子之书之间的渊源关系。司马迁著“史”而重“言”，不只与他对于《春秋》“寓褒贬”功能的认识有关，更与他视《太史公书》为子书相关。^②

汉明帝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诏班固》）^③汉明帝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从服务于政权的私欲出发，不满于司马迁著作的“贬损当世”，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可使他“扬名后世”，在这点上司马迁与以“颂述功德”的相如可谓异曲同工。

曹丕说：“唯幹著论成一家言。”（《典论·论文》）^④他还说：“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与吴质书》）^⑤曹丕两次以“一家言”称许徐幹《中论》，褒扬它立身不朽的立言功用，可见他眼中的子书地位明显比其他“文章”优越。

曹植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与杨德祖书》）^⑥曹植欲成的“一家之言”，从他“将采史官之实录”与“藏之名山”的表述来看，是继承司马迁的

①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3320页。

② 见李纪祥《〈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一文，《文史哲》2008年第2期。

③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14页。

④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21页。

⑤ 同上书，第591页。

⑥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40页。